

西部发展研究

XIBU | 2016
FAZHAN YANJIU

主 编 罗中枢

副主编 姚乐野 王 卓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封面设计：王...
文字编辑：王...
校对：王...

西部发展研究

XIBU | 2016
FAZHAN YANJIU

主 编 罗中枢
副主编 姚乐野 王 卓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周 颖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发展研究. 2016 / 罗中枢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690-1517-1

I. ①西… II. ①罗… III. ①西部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2016 IV.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7936 号

书名 西部发展研究(2016)

主 编 罗中枢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517-1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9.12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西部发展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任：罗中枢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铁	王 卓	石 硕	史云贵	朱晓明
罗中枢	次旦扎西	余潇枫	周 平	郝时远
姜晓萍	姚乐野	盖建民	潘志平	霍 巍

主 编：罗中枢

副 主 编：王 卓

编 务：罗江月 李静玮

学术支持单位：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西部扶贫与发展研究

边疆社会治理的理论思考	晋布次仁 / 003
助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打造西部精准扶贫引擎	牛汝极 / 007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	王 卓 刘海燕 / 011
资源开发与新疆资源型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1949—2011)	付志刚 / 023

“一带一路”专题

试析建设南亚陆路大通道的障碍问题	孙 勇 / 041
论内蒙古草原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以文物遗址为例	翟 禹 / 051

西部安全研究

新媒体条件下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工作探析	冯跃民 / 063
打造边防思想智库 服务边疆安全建设	贾 鹏 王望荣 / 070
从 1952—1962 西藏反分裂斗争中看党中央的科学决策	王 星 薛 梅 / 075
西藏边境地区基于军事安全需求的道路体系建设初探	吴 强 林克高 纪鲁宁 / 081
清代喜马拉雅宗藩体制的解体及其原因分析	崔海亮 / 086
缅甸华人华侨在保护中国在缅投资利益中的作用	秦永红 刘金卫 / 097

王思人 / 107

王一帆 / 119

倪 雯 / 129

XIBU FUPIN YU FAZHAN YANJIU

边疆社会治理的理论思考

普布次仁^①

一、“边疆”的概念

近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加剧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问题引起了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② 通常人们理解的“边疆”是地理意义上的，即地处现代国家边缘地带的一定地理区域。实际上，边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地理仅仅是它的维度之一。

空间是理解边疆的另一不可忽视的维度。马克思认为，空间是一种阶级冲突的表征^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一种感性的空间。在边疆语境中，它明显涉及了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内涵。“中心”有意无意地想象边缘，进而生产“边缘”。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边疆”大致是随着现代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历史上，一般用“前沿”“边陲”等词汇来描述现代所谓边疆区域。因此，边疆至少可以理解为由权力（市场、资源）、观念和地理构成的三维空间。

作为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它是山川阻隔、路途遥远、不易通达、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地方，也是国家的外防区域和腹心区的缓冲地带。王朝国家将中原确定为国家的核心区，而将国家统治权力所波及的其他区域确定为边缘区，并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治理。早在东汉，就形成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主张内外有别，这里的“外”就是中国早期历史中的“边疆”。在历史上这些区域远离政治中心，对它征税完全没有财政意义。因此，象征性的权力经常视作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群被纳入国家体系的支撑。

从文化意义上说，“边疆”的概念就不仅仅指地理风貌，还是地方与国家政治中心的地理关系，唯远离中心所在地才是边疆。凡能被称为“边疆”的所在，多是因为生息于斯的“边民”有着与主流社会不同的文化。^④ 因此，我们在谈“边疆”时通常隐含另外一个维度，即文化。例如，历史上曾一度把远离北京而毗邻大洋的

① 作者简介：普布次仁，西藏自治区区教工委副书记，区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教授。

② 知网上的统计显示。

③ 邹诗鹏：《空间转向的生存阐释》，《哲学动态》，2012年第4期，第17页。

④ 关凯：《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学术月刊》，2013年6月号，第139页。

珠江三角洲视为“边疆”，然而如今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文化意义上这一地区已经变成了国家“中心地带”的构成部分；与此相反，中国的甘肃、青海、贵州等地虽在地理上不属于边境，却时常被称之为“边疆”地区。

正如马克思所说，空间表征的是一种阶级冲突，那么“阶级”在此可以理解为社会群体的一种分类概念。在空间视野中考察“边疆”，我国现阶段中心与边缘的和谐是主流，但也无法避讳两者之间存在权力的不对等关系。由于中心的文明自信以及掌握资本的分配权力，将想象中的“边疆”进行现实化，而忽视了边缘或边疆的主体性、能动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打破“中心与边缘”的观念，抑或超越边疆的概念。边界是交流的结果，而社会因交流得以存在，相对性的边疆将会长期存在。但是，在边疆的社会治理中，以不同的维度全面理解“边疆”，将有利于社会治理的理论探索。

二、社会治理理论

在公共管理的视野中，社会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的运用和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治理”一词在知识界的首次运用可追溯到1989年世界银行概括当时非洲情形的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中“治理”一词所指的“控制、引导和操纵”之原意以及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公共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所理解的“统治”之意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给“治理”概念赋予了十分丰富的现代内涵。治理理论便是在这一概念基础之上在西方逐步形成的。关于这一理论的理解，在学术界争论较多。其争论的焦点是对“治理”概念的理解。^①据统计，目前在全球由不同机构和学者提出的“治理”概念近200条之多。^②其中，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的界定是目前最具权威和代表性的。这份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③。

治理理论在西方出现以来，引发了传统的社会管理理论的变革。在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主要模式，即官僚式的社会管理和自由主义

①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② 孙柏英：《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③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页。

式的社会管理。前者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一种社会管理,即倡导国家主义原则。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认为社会要由国家来管理。^① 在社会学领域,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将这类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概括为科层制或官僚制。而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框架的社会管理是市场主导型的社会管理,英国学者洛克提出的社会先于国家的认识是它的理论根源。^② 实际上,治理理论的出现与这两种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失灵”所带来的管理危机密切相关。西方社会中的“第三条道路”便是与社会治理相应的实践探索。在这一被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称为“不确定的时代”和被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称为“风险社会”,治理理论以“反思的理性”弥补了政府与市场的不足。

在中国学术界,自俞可平首次引入治理理念以来,学者们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学的社会控制理论等理论资源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理论探索。例如,郭英莉将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归纳以下四点:第一是公共权力的多元性,第二是各类主体的相互依赖性,第三是治理手段的多样性,第四是管理目标的明确性。^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钧研究员认为,强调“过程”,倡导“调和”,兼顾“多元”,注重“互动”是社会治理的四个主要特征。^④ 这在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社会管理理论。窦玉沛从历史的视角概括了中国社会管理的三种模式,即中国古代的“统治型”社会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管控型”社会管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政主导型”社会管理。^⑤ 作为社会管理的不同类型,三者具有一般社会管理的共同特点。郑杭生认为,社会管理就是“当地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价值等社会规范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⑥。

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治理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目标,这将在根本上推进社会公共管理的理念。社会治理至少包涵了三重维度,即历史性、整体性和地方性。这一理论思路与社会理论相呼应。马克思提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而涂尔干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存在意义在于社会。换句话说,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由个体构成的“原子式”群体,而是一个具有一定文化结构的集体。这一文化结构恰恰体现了集体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它规定和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让每一个

① 郭亚军等:《治理理论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民生》,2014年第4期,第147页。

② 郭亚军等:《治理理论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民生》,2014年第4期,第147页。

③ 郭英莉:《治理理论视野下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淄博师专学报》,2010年第3期,第54~55页。

④ 《北京日报》,2015年3月2日。

⑤ 窦玉沛:《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行政管理改革》,2014年第4期,第21~25页。

⑥ 郑杭生:《社会管理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魏礼群主编《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6页。

社会成员都享有归属感。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要进一步深刻认识文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边疆地区,城市和城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区域,充分发挥社区的能动性,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无疑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社会治理创新将有利于弥合空间意义上的“边疆”概念所蕴含的权力等级关系,有利于遏制“发展主义”思潮中形成的“中心与边缘”的文化思维,有利于消解边疆人民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话语生态中不断被边缘化的危险。由于我国西部边疆地区还是主要的民族地区,实际上,这一社会治理理念恰恰体现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精神实质。因此,在边疆的社会治理中,这一理论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关于边疆社会治理理论框架的一些思考

边疆社会治理的理论探索,必须基于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成功经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问题是中国边疆治理的核心和症结所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情况十分复杂。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然要将其置于整个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之中,置于社会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世界格局之中,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准确把握民族问题的特性以及它与社会总问题的普遍联系。

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民族问题不是只存在于某个时期的历史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从民族产生到民族消亡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与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概括为“八个坚持,一个加强,一个促进”。这一概括内涵丰富、自成体系,包含了政治路线、制度安排、指导思想、工作主题、精神纽带、民族关系等诸多内容。就这一体系的框架而言,从宏观的政治制度到微观的民族交流问题,面面俱到。由于具体的民族问题经常以社会矛盾表现出来,这一会议精神无疑为构建边疆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了民族理论维度的重要启示。本研究以此为基础,结合社会治理与边疆的最新认识,试图探索边疆社会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

助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打造西部精准扶贫引擎

牛汝极^①

一、西部省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在我国西部省区，尤其是西藏、新疆、四川、贵州等地，贫困面广且程度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人口素质不高、市场发育不良、支撑发展的财力不足等因素成为西部脱贫攻坚的重大挑战。比如西藏的贫困面广，全区 74 个县均为贫困县，贫困人口分布在 99% 的行政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25.02%，返贫率在 20% 左右，全区有 59 万贫困人口；全区有 70% 的贫困人口居住在高寒区和深山峡谷区；基础设施水平低，生产生活环境差等。新疆有贫困县 35 个（34 个在沙漠区域），占县市总数的 42%；贫困村 3029 个，占行政村总数的 35%；贫困发生率 15%。南疆四地州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占全疆的 75%、86% 和 83%，区域整体贫困严重，因灾因病等致贫、返贫现象突出。凉山彝区 2015 年底贫困人口 37.2 万，贫困发生率 13.4%。贫困人口多居住在高寒区、严重干旱区、地质灾害多发区，区内 13 个县均无高速路，尚有 9 个乡、453 个建制村不通公路；贫困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者占 53%；毒情、艾滋病疫情形势严峻。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看口粮，二看衣裳，三看住房，四看医疗有没有保障，五看劳动力强不强，六看家中有无读书郎。这就是“两不愁，三保障”的内容。

贫困问题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社会文化问题。脱贫攻坚既要消除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解决贫困的外因，更要消除文化素养上的贫困，解决贫困的内因。西部省区的农民如果不能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培育基本的文化素养，就很难实现持久脱贫。当然，改善环境和交通等基础条件也至关重要。

农村电子商务日益成为农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动力。电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随着支持政策出台，电商企业下乡，农村人才回流，发展呈现良好态势。然而，在西部农村电商发展中，尚有一些需要警惕的问题，既有认识不到位的情况，也有推进太急的现象。一些地方对电

^① 作者简介：牛汝极，哲学博士，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商的内涵和目标等还不甚明了,就想快速将电商发展到一定规模,有没有条件都要上,违背了经济规律;一些地方担心电商影响了实体经济,收不上税,因而犹豫不决;一些地方贪功冒进,盲目建设平台,一投入就是上千万元,结果没有流量,不懂运营,成为网上空壳商城;一些地方不重视扶持青年创业者,大众创业的基础不稳。

西部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自力更生的生态,本地服务就有足够大的市场。对于普通农村电商而言,最大的困扰是产品市场和客户群体之间不对接。农村电商想要把产品推广出去,但是最后发现受制于物流和其他市场竞争条件,适合做市场的反而是周边区域,农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费尽心思地把产品卖到外地去,而是需要一个能够着眼本地,解决本地农产品销售及生产资料再分配问题的平台。电商扶贫是解决销售问题,科技扶贫是解决生产问题。只有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才能有电商扶贫施展的舞台。

二、西部省区发展电商脱贫的几点建议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其实质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于“三农”,从而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通过调研,我们深刻感受到农村电商日益成为广大农村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电商扶贫已成为“十三五”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为了更好地推动电商扶贫工程,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要清醒认识到,越是贫穷的地方越要发展电商。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要高度重视,把电商扶贫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成立由各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联系机制,共同研究解决电商扶贫重大问题,协同推进各项工作。成立地方电商协会,加强电商、物流、商贸、金融、供销等方面的协同配合。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鼓励地方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相关资金打捆使用。引导基础设施投资向电信、交通、物流等短板倾斜。实行财政贴息,发挥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参与贫困地区电商建设。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实现“扶上马、送一程”。陕西洛川县曾是有名的贫困县,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发展苹果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5年的263元提高到2015年的12987元。

二是发挥示范引导作用。要解决农产品难卖问题,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必须开展示范试点工作,不断创新电商扶贫机制。新疆阿克苏市哈拉塔勒镇某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生产基地+股东+农户”产业模式,通过有机种植、统一加工、品牌销售,使参合农户平均增收两倍多。在贵州,能人带动贫困人群增收脱贫的实例很多,如大学生陆正鑫返乡创业扶贫,依靠平塘县农商银行小额贷款40多万元的扶持,形成了“养殖场+农户+批发中转站”的产业链,年销售收入达400多万元。这些事例说明,电商扶贫工程的关键在于抓好试点、创新思路。建议

有关部委延长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期限，扩大试点范围，力争用三年时间对国家级贫困县实现全覆盖。推动每个示范县发展一个特色农产品龙头企业，促进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与电商交易平台对接，并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农产品上行、贫困户就业增收。

三是发挥产业升值作用。推进农村电商必须以农业转型升级为前提。加快进度，加大投入，健全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认证、食品安全、产品包装标准，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推动电子商务相关立法，明确生产企业、电商企业、电商平台对于产品质量应承担的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加强执法监管，规范企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整合现有物流资源，推广第三方配送、物流超市等模式，通过物流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鼓励物流企业在贫困地区建立服务网点。打通产业链，对农业产业进行深度改造，提高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的质量管理服务水平。陕西宝鸡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把眉县独特的猕猴桃资源整合成猕猴桃优势产业，全县2015年猕猴桃产量45万吨，产值2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9400元（其中80%的收入来自猕猴桃产业），带动了农民，实现了精准扶贫。库布齐沙漠治理的成功在于发挥了科技和产业的支撑带动作用，携手“向沙要绿、向绿要地、向天要水、向光要电”，发展千亿规模的沙漠绿洲产业，治理沙漠1万多平方公里，带动了近10万群众脱贫。“水汽法”植树技术让种树效率提高了10倍，每亩成本降低了近2000元。近年又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输出“库布齐模式”。

四是发挥人才支撑作用。做到政府和市场力量“两条腿走路”。政府帮助建立专业的电商培训基地和师资队伍，以贫困地区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农业经营主体、普通农户为主要对象广泛开展电商培训。充分发动社会力量，组织动员电商企业，开展平台使用、经营策略和技巧培训。建立激励机制，引入并留住一批电商专业人才；激发从事农产品销售的微商的活力，使之成为广大农户运用网络销售产品的“电商经理人”。新疆、西藏的不少农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弱，不能融入国家的大市场，制约了农产品线上销售，针对这一情况，应鼓励返乡打工人员、大学生村干部等参加培训，成为带头致富的“新农人”。甘肃省山丹县祁店村曾是名副其实的贫困村，一位经商二十余载的村民担任村支书后，在农地经营上巧做文章，“复制”网上开心农场，经营私人订制家庭菜园，城里人争相租地种植绿色果蔬，体验农时农事，一亩地年租金近2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比十年前增长近20倍。

三、发展农村电商还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一是我国西部一些省区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发展欠账多。电商扶贫要根据西部各省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产业基础，建立符合实际、有所侧重的帮扶体系。在具备发展电商扶贫条件的行政村和自然村单列国家投资，主要投资方向为电商基层网点硬件设备购置、物流费用补助、宽带网络建设补助、冷链系统建设、人

才培训等。农村电商不仅仅是解决工业品下乡或者农产品进城，而是一个综合系统，是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同时，它也给扶贫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模式变革。

二是发展农村电商物流建设，基础建设需先行。新农村物流网的发展建设，首先需要硬件环境的支撑。农村路网不完善和部分现代物流设施的缺位，影响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对接。其次，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强，而且还应加强科学统筹规划，通过多种方式，建设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集聚性的公共物流服务平台（包括大型流通市场和物流园区等），以及围绕交通枢纽建设新型物流服务平台公路港、航空港等。同时，还要引进龙头物流企业。除了要因地制宜外，重要的是要积极引进第三方物流企业。邮政物流大有可为，邮政物流融入新农村建设之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其一，有较为完备的网络体系；其二，有较高的信誉；其三，有技术优势。对物流企业来说，农村市场将大有可为。

三是扶贫攻坚要在“扶”字上做文章。一要扶在心上，让贫困人口更多的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二要扶在身上，让贫困人口享受更优惠的社会保障待遇；三要扶在手上，让贫困人口提高自我动手能力；四要扶在根上，帮助贫困人口打好脱贫致富的教育文化根基；五要扶在路上，帮助贫困人口跟上现代化步伐。

我们相信，随着互联网创新成果与扶贫工作进一步深度融合，扶贫攻坚定会取得更大成就。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①

王 卓 刘海燕^②

摘 要：精准扶贫是现阶段突破贫困陷阱和扶贫陷阱的必然要求。文章分析了贫困人口的脱贫困境：贫困人口的脱贫主体地位被忽视；贫困人口的脱贫主体意识严重不足；扶贫利益相关方缺乏对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且忽视对贫困社区内生力量的培育。在此基础上，文章以秦巴山区贫困村个案工作的行动研究为切口，通过对贫困户增能赋权的干预，从扶持受困个体、培育自组织和优化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入手，实证分析了社会工作精准帮助贫困个体及其家庭稳定地脱离贫困困境的途径与效应，并建议在制度建设、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快政府购买专业性社会组织提供精准扶贫的服务的进程。

关键词：精准扶贫 个案工作 脱贫主体 增能理论

近年来，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济困的实践不断深化。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在促进农村困难群众生计发展、关爱农村留守群体、服务社会救助对象等方面逐渐积累了本土化的经验和理论。进一步探索社会工作与扶贫的关系，对于完善我国扶贫工作体系、发展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根据课题组在秦巴山区万源市贫困村（以下简称老村）近一年的驻村扶贫实践，针对贫困家庭的脱贫困境，以行动研究方法和社会工作的增能理论为主，全面呈现个案社会工作介入典型贫困家庭的过程和效应，研究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

增能（Empowerment）又称为充权或赋权，是指对于能力缺失的群体进行能力培养，使之具有某种能力。美国《社会工作词典》将增能定义为一种理论和方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彝族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16AMZ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作者简介：王卓，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秘书长；刘海燕，硕士，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